

大布乡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梁奇达

一、古老的村落

大布乡是一个古老的村落，据说建于明代，至今已有几百年历史。它坐落在中山旧五区上游（即今三乡镇），抗战时人口约 1300 人。多姓聚居，大姓有林、柯、孙、郑、黄、张，后来迁居来此的有麦、尹、苏等姓。大布乡初建时是在牛扒石下的龙岗坡。传说人们在此定居一段时间后，觉得龙气不佳，又举村迁至现址。大布乡背枕五桂山，面临金斗湾，岐关西路横贯村前，确是一派地灵气势。人们满怀希望，期待改变祖辈所遭受的贫穷厄运，特别是当辛亥革命冲破封建锁国的牢笼后，他们更是满怀希望，各自奋发图强。除了在家耕田之外，还闯南走北。有活力的人还远渡美洲、南洋，有的闯上海、广州，有的去香港、澳门谋求出路。虽然如此，在家务农的人，却仍被套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土地制度的绳索上，过着贫困的生活。绝大多数人住在又潮又黑的小屋里，寂寥的村庄，饥饿的村民，毫无生机。只有寥寥几户往外闯的人家盖起新房，日子过得稍好些。其中算有运气的是闯到上海经营茶叶并稍有名气的柯凤巢，他给家乡捐了 1200 元大洋，旅美华侨孙逸山捐了 1000 元大洋，凑合起建立了一所学校——大布学校，为儿童提供了受教育的场所。而其余外出的均寂寂无闻。即使像孙逸山这样的华侨，也无法供养儿孙一之在香港深造。其时，又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国难当头，这不能不引起在贫困、黑暗中挣扎的乡里青年的思考：我们的出路往何处寻？

二、革命性的转变

孙一之在香港目睹殖民地种种黑暗，中国人饱受侮辱歧视的现实，思绪万千，彷徨求索。而此时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踏进了中国东北、华北……祖国正处在危急的存亡关头。他毅然回到家乡，凭借他的学识和父亲献资兴学的条件，当上大布学校校长。他一面立志延聘一批进步教师，改造教育；一面广交同行和青年知识分子。在石岐，他结识了刚从南洋逃难回来的孙康——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因彼此思想相通，很快成为挚友，共同参加了“世界语研究会”。1936 年，在孙康帮助下，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大布乡第一个共产党员、中山第一个支部成员，随后又成为县工委领导成员之一。他为大布乡的历史谱写了光荣的一页。

1937 年夏，一个被陈济棠通缉追捕的共产党员梁浪舟，从广州转移到中山，担任中共中山五区工委书记的职务。为了便于工作，孙一之延聘他来大布学校任教务主任兼教员。随即在大布乡，成立了以梁浪舟为书记，叶向荣（在雍陌教书）为组织委员，孙一之为宣传委员的第一届中共中山五区工委。区工委积极分头活动，一边推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一边在爱国青年中进行党的教育。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鸦岗、平岚、桥头、乌石、大布、雍陌、马溪、平湖、沙岗以至下五区的造贝、北山、南屏等 10 多个乡发展了党组织，建立了乡的党支部。党员人数居全县之冠，工作开展得热火朝天，一些外区人暗称五区为“小延安”。

大布党支部先后吸收了郑少康、孙道溪、黄炳南、郑世雄、张远材、郑古、林帝杰（斗森）为第一批党员，成立了大布乡有史以来第一个党支部。经过党员的工作，推举孙一之为乡长，郑世雄、黄炳南为乡警队的正副队长。从此，大布乡的政权、教育、武装以至乡中各抗日团体的领导权均掌握在党支部手中，在党的领导下，为支援中山抗日武装斗争作了有力的准备，时为 1939 年。大概由于上述缘故，人们暗暗称大布乡为“红色的村庄”。

三、党的秘密机关的保护者

大布乡被人暗称为“红色村庄”还由于它是多届区县党的领导机关所在地。当时党处在不合法地位，倘若暴露了，就会遭到追捕杀头，所以领导人和领导机关必须隐蔽方能进行工作。大布乡由于有坚强的党支部，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还有一所完全在党支部掌握下的学校，

可以自主地安排担任各种秘密职务的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因此，从 1937 年秋第一届中共中山五区工委设在大布乡起，到 1939 年郑少康任五区区委书记时，也以大布乡为基地。关山 1940 年接任中山本部县委书记后，1941 年也来到大布乡，以教师名义展开工作。他领导一、二、四、五、六区党的工作。他的安全是靠了乡党支部和当地人民群众，学校只给他安排适量的工作，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党的工作，他的食宿等生活条件也是大布乡慷慨提供的。1943 年以后还有县区领导人司徒毅生、肖伟华等均在此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开展工作。像关山一样，他们得到了大布乡党支部和群众的保护、照顾。特别是 1940 年粤南省委书记梁广和王均予来中山视察工作，正值沦陷不久，敌情复杂，当时县委机关在翠亨村，在那里接待不安全，经再三考虑，最后还是选择大布乡，通过郑少康安排在大布乡后山果园内。这个果园由郑少康一家精心经营布置作为秘密工作联络点，果园的周围围以带刺的杂树，园内种上各种果树，果树丛里盖了一间草屋，是一个很好的掩体。领导来了，就由郑少康一家和一个专管果园的党员轮流放哨，郑少康妈妈送饭。前后两次任务均安全、胜利地完成。这任务对中山工作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时，原中山县委正受上级个别同志的指责，说县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时还怀疑县委领导混入托派和叛徒，县委的正常工作受到干扰。粤南省委到来了解情况后，明确地肯定了县委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怀疑县委不纯是无根据的。这对统一党内领导思想，正确指导抗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大布乡党支部及郑少康一家对此作出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

四、学校是藏龙卧虎之地

大布学校在孙一之任校长后，从 1936 年起，领导权就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在党的领导下，聘请一批进步教师进行教学工作。先后有县区党的领导孙一之、曾谷、梁浪舟、郑少康、关山、司徒毅生、肖伟华等同志，还有一批 20 世纪 30 年代末入党的老党员如高萍、许纯、谢月珍、温若萍等，此外还有从延安回来的张扬、陈雪，从香港聘来的美术家陆无涯、从广州聘来有音乐特长的陶亦夫等到此任教。他们不仅政治素质好，文化素养也较高。以这所学校为阵地，他们传播抗日救国的思想，宣传共产主义理想，传授文化知识，培育了一批有文化有理想的爱国青少年。先后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有 60 多人，光荣献身的 7 人，先后参加共产党的 10 多人。他们经过残酷的战争的锻炼，成为解放后各条战线的领导骨干，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在大布乡任教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不少人到部队工作，成为革命军队的指挥员；也有很多人成为党政各部门的领导骨干。梁浪舟到军队做政治工作；郑少康先任珠江纵队第二支队支队长，广东抗日武装北撤山东成立两广纵队后，他被委任为后勤部部长；关山任后勤部政治委员，随军南征北战，迎来全国解放的胜利；曾谷先任五桂山抗日民主政权党组书记，日本投降后，任命为坚持五桂山斗争的政治特派员；孙一之先到香港担任统战工作和华侨工作，兼任《今日中山》报主编，香港沦陷后回乡任谷镇区抗日民主政权秘书长；司徒毅生解放后任全国人大办公室副主任；张扬到澳门任《澳门日报》副总编；陆无涯先生回港后从事美术创作和战地记者工作，曾到沙鱼涌采访“东纵”北撤的情况，向海外同胞介绍广东人民子弟兵对抗日的贡献和北撤的政治意义；高萍、谢月珍等女同志回到五桂山担任抗日民主政权的骨干；肖伟华离开大布学校后，在执行任务时，不幸落入敌人魔掌，最后英勇就义，为革命、为祖国、为人民献出宝贵的生命。

长达 10 年之久，在激烈、复杂的对敌斗争中，到大布学校的各级领导及党员从未发生意外，都能顺利地完成自己的使命。这不能不归功于大布乡的党支部、大布乡人民对国家对党的事业的赤胆忠心。

五、对抗日的贡献

由于国民党疯狂地推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中山于1940年沦陷了。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军队统统逃到后方去，中山人民惨遭野兽般的日寇的烧杀、抢掠、奸淫。一部分群众害怕敌人的兽行，纷纷逃往港澳或后方，无法逃难的惶惶不知所措。中共中山县委为了惩治汉奸和日军，稳定民心，组织民兵积极行动，特别向大布、上栅党支部发出指示：立即调动民兵袭击雍陌、大金顶的敌军。

大布党支部接到县委的指示后，立即调动民兵30余人，由郑少康、郑吉、郑世雄率领，兵分两路，向驻守雍陌的日军进击。一路袭击公路的敌人岗哨，一路袭击敌师部驻地。大布民兵打响了中山沦陷后抗日的第一枪。枪声一响，敌人的哨灯灭了，敌哨兵被打伤了。攻打敌师部的一路枪声轰鸣，吓得敌人晕头转向，不知所措，盲目还枪，消耗大量弹药，更使敌人彻夜无眠，乱作一团。上栅民兵在大金顶也同时发起袭击。事后，我们发出“快报”，群众闻讯大快，香港《今日中山》用头版转载。海外同胞对党仍在沦陷区领导人民抗日感到快慰和鼓舞，纷纷表示要支援敌后抗战。

在抗战期间大布乡又是五桂山抗日部队的后勤基地。五区伤病员总站设在大布乡，潘仲任总站长，下属有桥头、乌石、平岚、鸦岗、雍陌、平湖、沙岗以及白石等乡。据不完全统计，经过总站再分到各分站的伤病员有百余人次，大布本身也设有9个点，分布在孙茂康、林康彩、容国庭、汪玉华、朱杰光、朱文化、林石卢、柯汉生、梁豪等家中。此外还有交通站，郑少康家是部队联络站，张萍（莲村）家是党的秘密联络站。这些站遭到敌人盯梢、抄查、恐吓，但他们没有被吓倒，反而更勇敢机智地去完成任务。粮站、税站、情报站也在这里设有分站。他们成为部队坚实的后勤基地。

大布民兵还协助主力部队侦察打仗。从1937年七七事变起，他们就开始活动，人数常保持20人上下。1941年起，直接配合五桂山部队执行战斗任务，重要的有：

1943年协助侦察伪联防大队长郑东镇。在珠纵副司令员谢立全亲自主持下，到大布柯凤巢大屋和村后果园研究敌情和侦察。民兵为他们放哨，先后两次分别由郑世雄、郑世杰引路到茶楼，察看郑东镇的相貌，孙一之还亲自到郑东镇家里“拜访”他，观察内情。这次行动，对后来打入郑东镇住所、谢副司令员亲自在他的地窖里认出并活捉他，起了重要作用。

其次，以大布为主联合三乡民兵组成有30多部车子的自行车队（后来人们称之为土机械化部队），协助主力部队远道奔袭古鹤伪军。他们以娴熟精练的车技，将战斗部队的指挥员及轻重武器，像天兵一样神速地降落在伪军面前，把敌人一个多排，连人带武器全部解决。并没收伪军一批稻谷，由单车队运回，一半给部队，一半分给群众。此消息不胫而走，传到附近伪军耳中，使他们人心惶惶，每当夜幕一降，无不提心吊胆，唯恐大祸不日会降临到他们头上。果然事隔半月，我部队又以同样方式奔袭萧天祥部，取得全胜，大大鼓舞了群众。

1944年，敌人分四路围攻五桂山，此时正值上级领导在石门开会。战斗一开始，司令部为确保领导安全，派了一主力连，把他护送上五桂山靠五区的顶峰上。事后，部队正拟下山向五区转移。不料时至晚8时，驻马溪的敌人仍不撤走。这时五区部队联合马溪、大布民兵，一边送饭给部队同志吃，一边侦察敌人，安排部队同志安全撤离五桂山。领导研究后，同意这一行动，决定在天亮前转移到丫髻山，由五区部队和大布派出民兵警戒岐关西路两端，同时派向导引路绕过马溪敌人，径直从大布村旁经三乡转移到丫髻山。结果天亮前上级领导干部和连队以及非战斗人员安全到达目的地。这一次行动，马溪、大布民兵立下了功劳！

六、抗日民主政权成立

1943年至1944年间，五桂山武装斗争取得一连串的胜利，解放了四、五、六区一大片土地，人民迫切要求建立自己的政权，保卫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随着谷镇（即现在的三乡镇）抗日民主政权的成立，大布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孙一之被选为谷镇区抗日民主政权的秘书长，兼大布乡乡长，郑世雄被选为集结队队长。这标志着大布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多

年流血战斗，第一次赢得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硕大果实，世世代代受尽封建专制和国民党专政压迫的人民第一次获得真正的人民权力，为自己的乡民服务，公开地、更广泛地为抗战服务。

乡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后，第一件事是发动群众减租退押，从封建地主手里夺回被剥夺去的利益，同时，抗日民主政权还向伪政权发出警告，以后再不准在抗日民主政权辖内征收伪军谷。伪政权果然不敢妄为，群众又得到一个实惠。

乡里的民兵改称集结队，在区政权统一指挥下，随时准备接受战斗任务。此刻是首先保卫好部队，在这里设置各种后勤站，特别是伤病员站，保卫伤病员的安全。

1945年“五九扫荡”开始，他们的工作更繁重。如保卫粮站，及时将粮食送到部队，保障部队的给养；协助五桂山区疏散非武装战斗人员到平原各地隐蔽，减轻主力部队的负担；配合区集结队在平原区牵制敌人，骚扰敌人驻地，使敌人无法集中力量到山区攻击我主力。

这个政权一直到解放战争期间仍然发挥作用。他们组织以朱杰光为组长的一共8个成员，建立兵站，专输送新兵到山区去。同时还建立交通站、粮站、税站，接受人民向部队缴纳爱国粮和各种税款。此外还有情报站等。他们先后动员了16人参加五桂山武工队。在这段时间，光荣牺牲在战场的就有5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部队北撤。国民党跑回来抢摘抗战的胜利果实，这个人民政权也就被扼杀了。政权存在时间虽不长，却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又经受激烈残酷的“五九扫荡”的严峻考验，民主政权的干部不仅坚强，而且取得人民民主执政的经验，为解放后建立人民新政权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选自《中山党史》2005年第1—2期）